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中生代”诗歌研究

刘 波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

ZHONGSHENGDAI SHIGE YANJIU

“中生代”诗歌研究

刘 波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生代”诗歌研究/刘波著;—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649-3594-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6111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责任校对 张 珊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诗歌生态与“中生代”诗人写作的主体性 …	(1)
-------------------------	-------

上编 “中生代”诗歌的整体图景

第一章 “中生代”诗歌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 ……	(17)
第一节 尊严写作与精神归宿：“中生代”诗歌的 价值追问 ……	(17)
第二节 存在感和难度意识：“中生代”诗歌的 话语尺度 ……	(33)
第三节 人文关怀与身份认同：“中生代”诗歌的 精神伦理 ……	(48)
第四节 期待视野和雅俗见证：“中生代”诗人的 思想境界 ……	(66)
第二章 “中生代”诗人的写作主题与技艺探寻 ……	(84)
第一节 经验的提纯：“中生代”诗人的日常书写 …	(84)
第二节 通向内在的交流：“中生代”诗人的“爱” 之书写 ……	(100)
第三节 日常如何再造诗意：“中生代”诗人的神 秘书写 ……	(115)

第四节	“抵抗”的美学：“中生代”诗人的力量书写···	(132)
第三章	“中生代”诗人写作的困惑与出路·····	(147)
第一节	对时代的凝视与面向内心：“中生代” 诗人的写作困境·····	(147)
第二节	精神如何接上“地气”：“中生代”诗人的 写作转型·····	(163)
第三节	现实、介入与转化：“中生代”诗歌的美学 流变·····	(178)
第四节	新媒体时代的突围：“中生代”诗歌的 多元呈现·····	(190)

下编 “中生代”诗人的个案透视

第四章	民间立场与自由美学的可能·····	(207)
第一节	伊沙：消解、反抒情与冒犯式书写·····	(207)
第二节	侯马：口语书写、生活转化与诗性正义·····	(223)
第三节	胡弦：经验、创造与时代的合力·····	(237)
第四节	雷平阳：那一道现代之光划过幽暗的传统···	(254)
第五章	持续性写作的意志和常态·····	(279)
第一节	臧棣：“新纯诗”精神与敞开的路径·····	(279)
第二节	清平：时光流逝中的语言坚守·····	(296)
第三节	蓝蓝：在介入中寻求诗的真谛·····	(311)
第四节	冯晏：哲思、历史感与难度写作·····	(328)
第六章	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诗学格局·····	(347)
第一节	李少君：自然之诗通向另一种美学·····	(347)
第二节	张执浩：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存在的激情···	(361)
第三节	毛子：在沉默中以爱穿越这个时代·····	(379)

第四节 陈先发：以传统对接当下的先锋	(393)
后记	(411)

绪论：诗歌生态与“中生代”诗人 写作的主体性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曾涌现出一批有胆识、富才情、见深度的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风格，也是当下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这一批“中生代”诗人，有的深入时代，有的沉潜内心，有的注重对汉语的独特审视和极致探索，还有的专注于挖掘诗歌的精神质地与人文情怀，他们的写作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美学。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人不仅创造了各自生动的语言景观，而且在精神追求上有一个共同的归宿，那就是敬畏、虔诚、爱和善意。对于这一时代的诗人，诗歌界和诗评界一般称之为“中生代”诗人，而在本书中，“中生代”诗人不仅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同时也有部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里，这些诗人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来源和写作背景，虽然他们不能被统称为一个流派，但对于整个当代诗歌史有着比流派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关于 21 世纪诗歌的一次访谈中，有研究者问我对 21 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是否满意，我的回答是：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只是觉得诗歌走上了一条正常轨道，也有了它既定的位置，在对其“合法性”问题不断的质疑中而有了“历史化”的可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也不乏精彩之作。当然，21 世纪以来

的诗歌也确实面临很多问题,甚至一度陷入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危机。对于有学者认为当下时代是中国诗歌生态最好的阶段,当属见仁见智的说法。诗歌写作是否真的需要依靠时代的馈赠?没有哪一个时代会专门为诗人写下经典作品预留空间和机遇,作品是否好,还是在于一个诗人的才华和素养,而非完全取决于时代状况、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21世纪诗歌的生态,也需要我们去关注,那不是某个群体的责任,而是关乎所有诗人在写作上的主体性。

一、如何认识当下的诗歌生态

关于“生态”一词,其实是与我们身处的自然息息相关。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意思是: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而我们常说的“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当“生态”这个词对接诗歌时,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直指诗歌内外的秩序,以及与诗歌相关的整个文化的外部语境和内部精神。诗歌生态这样的说法,既不显得突兀陌生,也没有生僻之感,好像还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意。其实无论从外部怎样认识当下的诗歌生态,它总是在恒定美学上内在于诗人的真诚创造和主体精神,且属于更为隐秘的灵魂法则。

诗歌在我们当下所处的生态,包含着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紧密相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它们也在矛盾或冲突之中相互制约,且构成了复杂的张力甚至悖论。比如,诗人写作与诗歌大环境的关系,诗人“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的关系,诗人的游戏精神与诗歌的神圣性之间的关系,诗歌边缘化与诗

人创作力旺盛的关系，诗歌刊物多样化与诗歌经典弱化的关系，诗歌评奖增多与优秀之作减少的关系，诗歌载体的拓展与读者审美疲劳之间的关系，诗坛娱乐化与诗歌严肃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诗歌生态的具体内容。总之，各种关系之间都会呈现出距离，这种距离正是 21 世纪诗歌生态的某种内面。诗歌生态好不好，取决于大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环境，也取决于诗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他在这个时代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和复杂处境的看法。

当我们都在以 10 年为一个阶段进行诗坛时代划分时，最后总难免陷入一个相对僵化的格局：每个时代的呈现，均以某一个年代最前面的 5 年为主，而对于后面 5 年出生的人，很快就被下一个 10 年出生的诗人所遮蔽或替代，一代又一代诗人的登台，就是以这样快速的方式在断代中延续或消失。还未及 1975 年之后出生的诗人出场，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诗人就迫不及待地被推到前台，成了关注的焦点，这也是按时代划分诗人的不甚合理之处。毕竟，年龄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而作品的好坏才是最终决定一个诗人优秀与否的衡量尺度。有些 80 后诗人，容易将诗写成碎片化的絮语，这好像成了某种诗歌的症候。而 90 后诗人们也不再像当初 80 后诗人出场时那样过分注重时代标签，这些表象化的存在，于提升诗歌写作的真正内涵来说，并不能构成主导性的影响，相反，它很可能是一种更为内在的贫乏，缺少了必要的异质性和力量感。

虽然“第三代”诗歌运动发生至今，诗人们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率真风度，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还是能够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关于文化觉醒的蛛丝马迹。整体观之，“第三代”诗歌运动有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特殊的社会语境和文化内涵，它不仅关乎平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一场先锋文学的启蒙运动。如果

时间回到当下,可能不会再有人对诗歌持以那种非理性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走南闯北,靠诗歌描绘出了一个时代的狂欢图景。对于“第三代”诗人来说,不管他们犯下的是“滔天罪行”,还是不明世事的过失,其对诗歌的态度不乏真诚,他们当年也许正在靠近通往诗歌内部肌理的秘密通道。

回到 21 世纪的诗歌现场,我们会发现,诗人的狂欢和诗歌的娱乐化不仅形成了一股合流,而且也影响到整个 21 世纪的诗歌生态。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那场诗歌热潮不同,它更多的是浮于表象,缺少了当年相对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没有一种深入内核的诗学伦理。这似乎与当下整体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有关。公众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压,诗人无权干涉,但对于诗人来说,如果自己也参与其中,与公众和媒体一道围观、嘲讽,那么,这是诗歌本身还是诗人的心态出了问题?就像有清醒者所言,诗歌的敌人还是在于诗人自己。比如一些诗歌奖并非完全针对优秀作品,而是权力的交易,这不仅会拉低诗歌本身的水准,而且会让很多人出于功利化的目的来写诗。诗人如果只追求强势的见面率,而不注重作品本身,也就难掩本末倒置的伪装。这也是我对伊沙几乎每个月都要晒诗的行为不太感冒的原因,像是为了完成任务或为了凑够字数一样,他那些没有多少沉淀的诗作能让我们产生阅读的信任感吗?

当有的诗人在自我感觉和言论上变得极度膨胀时,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往往是以诗歌的名义来博取名利,而忽视了写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学本体和审美的创造。很多诗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迈进诗的王国,但后来并未深入其中,多浅尝辄止,缺乏时间磨砺所带来的厚重感。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属于诗歌的“辉煌”时代,可仅仅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而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个需要辨明的“灰色地带”,诗歌看似沉寂了,被边缘化

了，其实也从另一方面回到了它自身应有的位置。这一从神坛回到地面的过程，也让很多亲历者见证了诗歌在精神上的回归，这是如今诗歌被历史化之后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现实。由此试问：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再至21世纪，在各种潮流的更替中，先锋诗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产性？翻一翻有些诗人的创作履历表，有多少诗作值得我们去回望和细读？这些看似潜在的问题，对于很多诗人来说正是写作的根本。当语言本身的灵光闪现时，过度的松弛可能会妨碍他们抓住这转瞬即逝的一幕，从而丧失了必要的紧张感所能激发的潜力。这一症结可能还是在于不少诗人缺乏超越意识，过分简化了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知识结构的单一性导致许多诗人无法走出平面化的单调表达，而趋于更高的境界。若如此，写作就容易陷入模式化，流于表象和简单，乃至很快就湮没于无闻。“现在许多诗无非是自我的人微言轻的戏剧化，却埋怨读者冷落。”^①于坚真正道出了我们当下诗歌的生态：诗人自我的人微言轻的戏剧化，如同语言上的小丑，这样的角色又何以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种小情小调的自我满足，更难让人产生美学上的共鸣。他也不是要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而应与自然物事做平等的对话，以此激发语言和自我内部的活力。“诗歌的活力发生在词与词的组织间，但照亮这一切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创造力。”^②写出属于自己的“诗”，其实是一个相对微观的行为，诗人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词，而让词生发诗意的，当是他

① 于坚：《我的写作不是一场自我表演——2007年答记者问》，《作家》2008年4月号。

② 姜涛：《辩护之外》，《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的视野、想象力、价值观和精神创造交融的综合能力。

二、怎样面对功利心态和“语言暴力”

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更多时候应呈现为自由的个体性、多元化,且有它必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任何一种生态都无法完全容纳进所有的写作风格,而生态要达到平衡,其实就是诗歌内部各种风格相互博弈的过程。诗歌写作上的不合时宜,都只是与当下和现场的较量,一旦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拉开时间距离后,也许我们就需要重新看待它所代表的美学。

在某种功利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修辞的粗鄙、力量的弱化、思想的匮乏等,似乎都与特定的时代氛围有关,浮躁、娱乐化、自我的分裂也导致写作的严肃性和历史意识不断被消解。当各种虚幻之象偏离了文学的本质,真正的诗意如何重构?有感而发又如何去对接想象、身份意识与现代性之间的通道?这需要的不仅是常识,更重要的是,在写作技艺和德行、伦理的融合里,怎样再造一种守常的、恒定的先锋诗歌美学?尤其是在反常识的时代,虚伪的写作在与诗歌本质的博弈中,很容易陷入庸俗的应景,普遍的同质化意味着无效写作的来临,这也是诗歌生态失调的体现。

当下诗歌的生态投射到现实中时,我们也难免会感受到“繁荣”背后的“乱象丛生”。不少人处于虚张声势的惶惑,因为缺乏内心的安全感,对于抓到物质的欲望异常强烈,而精神之事,则一半是享乐,一半是恐惧,这种矛盾交织的分裂现实,投射在了很多人的文字中,便体现为急促、草率、追求灵感的碎片化。然而,宽广的文学精神于此形势下大都处于被遮蔽状态,诗人能真正沉下心来用心去写作纯粹的、有方向感的文字,当为一种“自我

完成”。自律性形塑的是诗人对诱惑的抵制，而在具体文本中，它表现出的是节制和内敛之美。如果创新变成了表演，写作也就难言纯粹了，那是在向外走，而不是往内部靠近诗性的逻辑。很多诗人所追求的与众不同，不是内在精神的创新，只是表象的花样翻新，这种时髦缺乏持续性的精神力量。诗人越是心态浮躁，其写作就可能越发显得孱弱、乏力，最终离文学的本质越远。这种只是为了远方而无法“回到人间”的写作，也是当下诗歌生态的重要一极。其实，真正与诗歌有关的，不是那些缥缈的东西，而在于诗人写出的语言之美和思想之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的伦理态度乃至他的气质，都是由他的美学所确定、所定型的。这一点可以说明，诗人为什么总是发现自己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死亡率显示了由现实在现实和文明之间设定的距离。”^①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虽然有必要的“敌意”和距离，但是没有凝视的聚焦感，也可能会走向时代的反面：文字即表现为一种无限夸张的美学暴力，无限向上或趋远，缺乏肉身的具体质感。也许诗人的个性化呈现，并不一定要以牺牲肉身作为代价，他的语言行动属于精神财富的创造，这是对“距离产生美”的一种思想性回应。

当然，“敌意”和距离皆非刻意，对于诗人来说，保持自然状态，是要在写作中重新寻找个性化的创造。在此，我想起了瓦莱里在区分波德莱尔的作品与浪漫主义诗歌时所言：“在波德莱尔最好的那些诗中，有一种肉体与精神的结合，一种庄严、热烈与苦涩、永恒与亲密的混合，一种意志与和谐极其罕见的联合，这将他的诗与浪漫主义的诗清楚地区分开来，也与巴那斯派的诗

① [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唐烈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10页。

清楚地区分开来。”^①也就是说,波德莱尔的创造是独属他自己的,既有别于浪漫主义,也不同于“纯诗”写作和玄学派,这些古典与传统的形式,构成了波德莱尔在他那个时代写作中的参照,而他从现代性中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和“个体抒情”。个性自由是诗人作为创造者的心态,他在释放自己天分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学习和创造的意志,如果对此把握不好,就很难避免写作的自我复制和同质化。外部阅读环境的轻浅和诗人主动降低要求的心态一旦合力,会导致当下的诗歌生态失调:诗歌刊物大量涌现,各种奖项名目繁多,表面上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实则内里困惑重重。很多杂志就是做诗歌拼盘,各种大杂烩良莠不齐,既无鲜明特色,也无特别主旨,绝大部分作品皆显平淡,这与编辑的趣味和素养有关,同样,诗人们的自我追求和精神底线也遭到了瓦解。流派、运动、组织,似乎已经很难解决问题了,唯有作品本身可以验证诗人的努力,为诗人获得写作的尊严。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诗人正是通过诗歌运动走到了文学的前台。有些“著名诗人”因身份的改变而有了优越感,其写作开始弥漫一股腐朽之气,陈旧保守的趣味也暴露无遗。“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是诗人的宿命,既有辛酸,也有无奈,但那份诗性经验,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当是某种抵抗的力量。他们反对过于喧嚣的写作和拉帮结派的集体狂欢,也拒绝那些强行进入文学史的命名、概念和炒作,这是需要自我调整的底线。

不管身处何种时代,诗人只有与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有时甚至不乏以旁观者的心态切入和审视,如此方可抓住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写作远离浮华,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文本法则上。加

① [法]保罗·瓦莱里:《波德莱尔的地位》,《文艺杂谈》,段映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180页。

缪在《反抗的诗歌》一文中引用了霍桑评价小说家麦尔维尔的话：“他虽然不信宗教，却并未停止于此。”也就是说，作家于宗教之外仍在思考。在这样一种对比后，加缪道出了诗人们所应该拥有的追求：“关于那些向上天冲击的诗人们，也可以说他们想推翻一切，同时又在绝望地思念一种秩序。他们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想从非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为一种方法。浪漫主义的这些主要继承者声称要让诗歌成为榜样，在最令人悲痛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使亵渎行为神圣化，让诗歌转变为经验与行动的手段。”^①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和行动的力量，可以让人变得隐忍和通情达理，也可以变得自恋和无所顾忌，这都取决于一个诗人的冒险、节制和对审美的认知，当然，这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诗歌氛围、读者认知与美学接受等。诗人的主体性建构，就是要在内部主导与外部融合中逐渐实现话语场域的开放，并以其反馈重新调动诗人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

有些诗人会关注个体在特殊时代中的遭遇，聚焦于“体制性毒素和罪恶”，这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而诗人如何使用话语权，便显得异常重要。有时，意念很难让一个人对语言保持持续创造的热情，美学的诱惑终究抵不过物质匮乏和不满足所带来的焦虑，以及对精神之事的不信任与价值疏离。很多诗人既迎合主流，也拥抱非主流，这样既安全又能两边讨好，骑墙状态正是他们的生存哲学。这也就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缺乏思想力度与批判精神的原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言：“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②要想有能留诸后世的作品，一个诗人不

① [法]阿尔贝·加缪：《形而上的反抗》，《加缪全集（散文卷I）》，丁世中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33页。

② 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96页。

仅要追求创造性的语言表达,还需有独立立场和自我反省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停留在姿态上,更需体现在实际行动和写作实践中。不论是写旧时月色,还是记时代新账,诗人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三、审美的信念与写作的主体性

沈卫威在论述胡适派文人时曾说:“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的极向发展,往往会朝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乃至激进的政治革命变移。文化激进思潮的勃兴是由社会危机和政治无能(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的失望)逼迫出来的,它的演进最终必然会走向激进的政治革命。因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意图伦理,在于它以谋求权力和体制的全面更替来摆脱社会的深刻危机。而社会政治机制的大变革需要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群众心理、公共空间和文化土壤。”^①这段话颇能说明富有思想的诗人们,由文化自由主义开始,经过社会黑暗的“洗礼”,最后转变成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这样的转变,到底是出于良知,还是知识人在精神层次上的提升?

这其实指涉了一种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即写作的个性风采与普适价值的融合,此当为理想状态。然而,很多从不读诗的人,或者将诗人当作小丑的人,要么对诗歌不屑一顾,要么报以嘲讽之意,面对如此生态,诗人在保持良好心态的同时,当反思写作本身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心读诗的人来说,在开始时可以给他的建议无非就是,让自己的眼睛努力适应笼罩着现代诗

^①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04页。

歌的晦暗。”^①适应阅读的晦暗，这是现代诗歌给读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但这不是人群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美学问题。当下，仍然有那么多读者无法理解“诗的晦暗”，尤其是有阅读难度的作品，同样被认为是“不好的诗”或“坏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代汉诗的生态确实难言好坏，因整体诗歌审美精神的普遍欠缺，我们对诗歌的惯常理解基本上来自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然而，语文教科书上的诗歌篇目，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呢？意识形态的抑或普及层次的，它们影响了多数中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能力和境界。因此，诗歌成了小众的文体，而诗人也相应地成了“少数派”。

在 21 世纪的文学生态中，诗人该如何正确地去看待诗歌的边缘化，这是写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诗歌的边缘化，本身可能就是其常态，或许离开了中心，一个人才有清醒对话的可能，才有逐渐靠近真相、抒写经验的力量。在表达上，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想象有余，而经验不足，冲动有余，而节制不足；在语言上，华丽有余，而思想不足，介入现实有余，而美学提升不足，这些都是当下诗歌写作面临的困境。此外，很多诗人喜欢走极端，或热衷于炫耀式的知识堆砌，或追求放纵式的情感宣泄，怎样去准确地把握中间那个度，让想象力和思想性对接，使语言表达和现实人生相联，让现实性与历史感结合，这些都是诗人应该去考虑的问题。由此，他当找到有效的写作路径，既让自己的表达符合对真善美的建构，也要不惮于直面和辨析这个时代的现实困境，让诗歌在思想和艺术的层面，达致一种开放和互动的格局。

就当下表象繁荣的诗坛而言，追名逐利成了常态，真正能沉

①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第 2 页。